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/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.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4.2
(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叢刊)
ISBN 978-7-101-09944-7

I. 田… II. 北… III. 中國歷史-古代史-文集
IV. K220.7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05107 號

書名 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
編者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
叢書名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叢刊
責任編輯 李 靜
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
版次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規格 開本/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張 46½ 插頁 2 字數 1000 千字
國際書號 ISBN 978-7-101-09944-7
定價 188.00 元



田餘慶先生近照

目 錄

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編集說明	榮新江 羅 新(1)
在慶壽會上的發言	田餘慶(3)
我的學術簡歷	田餘慶(7)
耄耋之年話教書	
——訪歷史學家田餘慶教授	(11)
田餘慶先生訪談	(17)
說“史記”	
——兼試論司馬遷《史記》的得名問題	祝總斌(22)
論康有爲、章太炎的古代官階研究	閻步克(31)
司馬遷“成一家之言”新解	陳蘇鎮(50)
曹窰與漢初政治	陳侃理(57)
漢代詔書之三品	馬 怡(65)
漢代授鳩杖制度探究	
——兼論授鳩杖制度從先秦到漢代的變遷	莊小霞(84)
淺議簡冊制度中的“序連”	
——以出土戰國秦漢簡爲例	何 晉(96)
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 J1③:264—294 考釋	侯旭東(113)
兩漢行政“故事”中的古“禮”子遺考	楊 英(120)
名教的悖論	
——漢末浮華之風	景蜀慧(148)
東漢、三國時期山陰、吳縣鑄鏡銅原料的來源	王 鏗(162)

曹窋與漢初政治

陳侃理

曹窋是漢惠帝相國曹參之子。劉邦初起，曹參即以中涓從龍，其後“攻城略地，功最多”，唯因劉邦偏愛蕭何，論功時最終屈居第二^①。惠帝二年，蕭何卒，曹參以功次代任漢相。參為相務清靜無為，惠帝怪其終日飲酒不治事，命其子窋諫參。參怒，笞窋二百，後見惠帝問對，乃有“蕭規曹隨”的佳話。這是曹窋在歷史上最為人所熟知的一次記載。然而，以曹窋顯赫的出身和地位，其政治表現應不止於此。細繹史籍關於呂后、文帝之際政變的記載，可以發現，他在其中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而其後又突然從載籍中消失。這些現象值得注意。重讀這段歷史，發掘其中尚未為人重視的幽微之處，或可幫助我們對西漢初年的政治史獲得一些新認識。

《史記·曹相國世家》載，曹窋“高后時為御史大夫，孝文帝立，免為侯”^②，此後便不再有任官的記錄。關於曹窋免官，《史記·張丞相列傳》亦有記載：

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。高后崩，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，免。^③

此事《漢書·張蒼傳》作：

高后崩，與大臣共誅殺諸呂，後坐事免。^④

《史》、《漢》所記，明顯有別。清人梁玉繩以為《史記》衍“不”字^⑤，張文虎引其說^⑥，中華書局點校本遂據以刪字。前賢信從此說，自有其根據。他們注意到，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記載曹窋在誅殺呂產的過程中為周勃奔走報信，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，沒有理由說他不曾參與誅殺諸呂的事

① 《史記》卷五三《蕭相國世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第2016頁。

② 《史記》卷五四《曹相國世家》，第2031頁。

③ 《史記》卷九六《張丞相列傳》，第2680頁。“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”，中華書局點校本據梁玉繩說刪“不”字（2013年新修訂本亦然），非是。此仍錄原文，不從點校本。

④ 《漢書》卷四二《張蒼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2098頁。

⑤ 梁玉繩《史記志疑》卷三二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，第1345頁。

⑥ 張文虎《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》，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第604頁。

件。不過，各家都忽略了，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所稱的誅殺對象是有區別的。《史記》稱誅“呂祿等”，《漢書》則作“諸呂”。推敲文意，《史記》所謂“呂祿等”應該不包括呂產在內。

案《呂太后本紀》所載“諸呂”，呂后有二兄，長兄周呂侯澤，高祖八年死事^①，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。呂澤二子，長子台初封酈侯，呂后元年（前 187 年）立為呂王，次年薨，子嘉嗣。呂后六年，呂嘉坐居處驕恣廢，以其叔父即呂澤次子產為呂王。呂釋之卒後，其嗣子有罪廢，立次子祿，七年秋更立為趙王。八年十月，又立呂台子通為燕王。終呂后世，呂氏凡三王，而呂產最長，號呂王^②，為呂氏大宗，呂祿則是其從弟。呂后崩，以呂產為相國，官位亦在上將軍呂祿之上。漢文帝封賞誅殺呂氏的功臣，詔書曰“呂產自置為相國，呂祿為上將軍”^③，將呂產置於呂祿之前，可以反映當時對諸呂次第的認識。若舉一人以代表諸呂，無疑應是呂產。《史記》不云“誅諸呂”，亦不云“誅呂產等”，而曰“誅呂祿等”，當有特殊的緣故。

考察《呂太后本紀》所載大臣誅諸呂事，可以發現其過程分兩個階段。第一階段為呂后八年九月庚申日^④，大臣奪取北軍，擊殺呂產。此日旦時，曹窋見相國呂產議事，無意中聽到郎中令賈壽來與呂產密謀，告知其派出平齊的灌嬰已倒戈，與劉氏齊、楚王合縱，欲誅諸呂，並催促呂產迅速入宮發動政變。曹窋立即向丞相陳平、太尉周勃報告，使之得以先發制人，奪取北軍。然而呂產仍掌握着南軍，準備入宮劫持少帝，以制群臣。曹窋又將此謀告知陳平，乃受命聯絡衛尉，令其阻止呂產入殿。此時呂產不知呂祿已棄北軍，率領南軍突入未央宮，因衛尉阻攔，只能在殿外徘徊。曹窋見狀，恐不能勝產，又馳告周勃。周勃遣朱虛侯劉章入宮擊產，日晡時，因天風大起，呂氏兵亂，才得以誅殺呂產。這雖然只是一日之間的事，但透過司馬遷的敘述，仍然可以想見腥風血雨之中的緊張和曲折。其間，曹窋果斷報告呂氏密謀，使周勃得以先發制人，然後又奔走馳告，在勸說衛尉和召喚援兵兩個重要環節起了關鍵作用。可以說，此役曹窋充分表現出他的果決識斷和對劉氏的忠誠，立下大功。

呂產是呂氏的宗族領袖，也是族中最難對付的人。周勃遣劉章入宮時，因擔心無法取勝，不敢公開聲討諸呂，只明令劉章保衛少帝，給自己留有後路。劉章誅呂產後，說：“所患獨呂產，今已誅，天下定矣。”^⑤可見呂產之死的轉折意義。此後，誅諸呂便進入了第二個階段。在這個階

① 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稱“周呂侯死事”，據《史記·高祖功臣侯表》、《漢書·外戚恩澤侯表》，其卒年當為高祖八年。案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“八年，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。”呂澤可能就歿於此役。

② 《史記》卷九《呂太后本紀》載七年二月徙呂產為梁王，又更名梁曰呂，是產雖徙封，而仍稱呂王。高后崩，《史記》云遣詔“以呂王產為相國”，可證。其後史文偶有作“梁王產”者，蓋因呂王死而梁地即復曰梁，後世追述不必盡從前代之號也。

③ 《史記》卷一〇《孝文本紀》，第 418 頁。

④ 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、《漢書·高后紀》均作“八月庚申”。案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云文帝“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”，《漢書·文帝紀》亦云“閏月己酉”，然則是年閏九月辛巳朔，九月辛亥朔，八月壬午朔，庚申日不在八月而在九月。史文有誤。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云：“九月，諸呂呂產等欲為亂，以危劉氏，大臣共誅之。”（第 413 頁）《資治通鑑》亦繫此事於九月，《考異》云，推長曆，此八月當為九月。見《資治通鑑》卷一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 年，第 433 頁。

⑤ 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云朱虛侯劉章殺呂產及呂更始還，“報太尉，太尉起拜賀，朱虛侯曰：‘所患獨呂產，今已誅，天下定矣。’”點校本標點作：“太尉起，拜賀朱虛侯曰：‘所患獨呂產，今已誅，天下定矣。’”（第 410 頁）以此為周勃語。案若然，則“拜賀”後無需“朱虛侯”三字。今從中華書局本《資治通鑑》（第 434 頁）句讀，以此為劉章語。

段，劉氏天下的危險已經解除，呂氏失去招架之功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剩下的問題就是善後，包括處置呂氏宗族和呂后所立的少帝。

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載，周勃得知呂產的死訊後，“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，男女無少長皆斬之”，次日辛酉，“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（呂后妹，樊噲妻），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（呂后外孫）”。又次日壬戌，“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”。隨後，大臣密謀，誣稱少帝及梁、淮陽、常山王皆非惠帝子，廢而改立代王劉恒（後來的文帝），遂而又誅滅包括少帝在內的惠帝諸子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在這些事件的記載中，第一階段非常活躍的曹窋突然消失了蹤影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？

與此相關，事件中還有幾個疑點，或許可以幫助推進思考。首先，在漢朝建立的過程中，呂氏輔佐劉邦，功勳卓著，且與劉氏子弟和一些重要的元功大臣有著盤根錯節的姻戚關係。呂產死後，呂氏已經失去抵抗力，是否還應將其族滅，不會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問題。史載酈寄（字況）與呂祿交好，因其父酈商被劫，而助周勃欺騙呂祿交出北軍，事後“天下稱酈況賣交”^①，可見當時同情呂氏者為數不少。族滅呂氏，一定會有阻力。對此，《史記》文辭隱晦，不見記載，但詳述“男女無少長皆斬之”，又云“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”，細味之下，似有暗諷周勃等行事過激之意。如果當時就有人出來反對，那麼會是何人？其次，是審食其的復相。審食其早年為舍人侍呂后、惠帝，由此得幸於呂后，及稱制，以審食其為左丞相，監宮中，公卿皆因而決事，權力極大。呂后死，他轉任帝太傅^②，實際上被剝奪了相權^③。誅諸呂時，史文未載其有功，但在次日，他便復位左丞相，重新進入權力中心。作為呂后的倖臣，審食其竟能在諸呂被殺後東山再起，其中應有隱情^④。

與審食其之得意相映成趣的，是曹窋之免官。《史記·曹相國世家》記載曹窋免官在文帝立後，但據《孝文本紀》，文帝至長安時，御史大夫已是張蒼^⑤。案《呂太后本紀》，文帝至長安在己酉日，上距誅呂產之庚申日僅四十九天。又，張蒼任御史大夫前在壽春（今安徽壽縣）為淮南相，

① 《史記》卷九五《酈商傳》，第2663頁。

② 審食其為帝太傅的時間，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云在“呂后已葬”後，《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》繫在呂后八年七月辛巳，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則繫於七年七月辛巳。今本《史記·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》非司馬遷原作，前人辨之已詳（參余嘉錫《太史公書亡篇考》，《余嘉錫論學雜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31—35頁。），但其為西漢時人（疑是馮商）所補，與《史》、《漢》本文相參，仍有重要的史料價值。案《漢書·高后紀》，呂后死於八年七月辛巳，顯是今本《漢書》將八年事闖入七年，當從《名臣表》改正。據《漢書·高后紀》及《百官表》月日，則審食其或是在呂后死後當天即轉任，未必待到已葬之後。

③ 漢惠帝死後，右丞相王陵反對立呂氏為王，觸怒呂后，呂后“欲廢王陵，乃拜為帝太傅，奪之相權”。事見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，第400頁。審食其從左丞相而為太傅，可與此類比。

④ 《史記·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》、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云審食其於呂后八年九月丙戌復為丞相，後九月免。案是年九月無丙戌，《呂后本紀》云復相在壬戌，當從之。又，《呂后本紀》於誅諸呂條前云“左丞相食其免”。當時食其已為帝太傅，不當復云免相，參考兩《表》，疑是同年後九月事錯簡於此。

⑤ 參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，第415頁。關於曹窋免官、張蒼繼任的時間，王先謙據《史記·呂后本紀》、《漢書·高后紀》八年“八月庚申”條所謂“窋行御史大夫事”，認為曹窋“前雖真為御史大夫，高后已詔張蒼代之，蒼未任事以前，窋尚在官，故僅謂之行事”（見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66頁上欄）。然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以曹窋之免在大臣誅諸呂事後，王說仍顯牽強。或此“行御史大夫事”僅指履行職事，非有臨時代攝之義，抑或另有隱情，只能暫時存疑。

從任命發出至張蒼到任，時間應不少於二十天。也就是說，從誅呂產至曹窋被免去御史大夫，時間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月。《漢書·張蒼傳》云曹窋“坐事免”。根據班固的說法，曹窋“與大臣共誅殺諸呂”，立有大功，有什麼事能夠讓他在此後的短短一月內被免職，實在令人費解。又，曹窋死於文帝後元三年（前 161 年），距呂后八年尚有近二十年。在此二十年中，曹窋竟沒有任何任官的記錄，與他的身份及漢初的習慣很不符合。這或許從另一個方面暗示，導致曹窋免職的絕非尋常之事。那麼，到底是因為什麼呢？

帶着這些疑問，再來看《史記·張丞相列傳》的記載，就會有與前人不同的理解。“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，免”，已經說明了曹窋免官的原因。司馬遷云“呂祿等”而不曰“諸呂”，是有意將呂產排除在外。顯然，第一階段誅殺呂產，曹窋發揮了重要作用，但第二階段大臣誅殺呂祿等人，他並沒有參與。“與”在古漢語中還從“參與”引申出“贊許”之義，《史記》此處亦可解作後者。曹窋不僅沒有參與誅殺呂祿等，而且不贊成乃至反對周勃等大臣的決策。正是這個立場，使他被免去了職務。

二

呂產死後，劉氏統治的威脅解除了。但對於執事大臣們來說，殘酷的政治抉擇才剛剛開始。接下來，他們不僅要把握政權的走嚮，還要為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慎重考慮。從呂產死到迎立文帝的短短數十天內^①，大臣們做出了若干極為重要的決定，其間一定有分歧、爭論、妥協和交換。事涉廢立，極度敏感，史文的記載簡略而模糊，只能通過蛛絲馬迹，推測其中的細節。

當時在位的少帝劉弘，是惠帝之子，呂后的外孫。少帝之母惠帝張皇后^②，是呂后長女魯元公主與張敖之女，少帝皇后則是呂祿之女。呂氏政變失敗，沒有改變他們外戚的身份。只要少帝在位，呂氏不滅，總有復興的機會。這對誅殺呂氏的周勃等人非常危險。在他們看來，要防止呂氏復興，最可靠的辦法是斬草除根。族滅呂氏之後，要預防復仇，還需進而廢除呂氏擁立的少帝。《史記》載其密謀云：“今皆已夷滅諸呂，而置所立，即長用事，吾屬無類矣。”^③為自身計，劉氏功臣們立即着手處理這兩個問題。

族滅呂氏，此時已經不難。廢除少帝，則必須有充分的正當理由，首先就要否定少帝的皇位繼承權。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載：

諸大臣相與陰謀，曰：“少帝及梁、淮陽、常山王，皆非真孝惠子也。呂后以計詐名他人

① 呂后八年九月庚申誅呂產，後九月己酉，文帝至長安，其間共四十九天。使者從長安至代，代國君臣入都，途中至少需要二三十天，則迎接代王劉恒的決議，應是在諸呂產後的一個月內作出的。

② 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言張皇后無子，前、後少帝及梁、淮陽、恒山王皆取後宮美人子名為己子。即便這個記載屬實，少帝在名義上仍是張后之子。

③ 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，第 411 頁。

子，殺其母，養後宮，令孝惠子之，立以爲後及諸王，以彊呂氏。”

《史記》前文僅云前少帝非張皇后所生。大臣密議則說惠帝諸子梁王皆非劉氏，這就徹底剝奪了少帝和孝惠皇子諸王的合法性。其所議是否屬實，現在已經無法確證。《史記·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》於常山前王義（後之少帝）、後王朝、淮陽王武，均云惠帝子，唯在“常山國”下記王朝在呂后八年以“非子”誅，國除^①。司馬遷保存不同的說法，或許表明了他的疑慮。當時的外朝大臣如何能够了解此等最隱秘難言的後宮秘辛，並且宣之於衆而讓人信服？這確實值得深思。

此等駭人聽聞的大事，須由一位經常出入後宮且與呂后極爲親近的大臣說出，才會讓人有幾分信服。當時最適合扮演這個關鍵角色的，正是審食其。呂氏稱制期間，審食其作爲左丞相長居宮中，與呂后私通，應是衆所周知的秘密。呂后一死，呂產等不願再與審食其分享權力，故以之轉任帝太傅，明尊其位而實奪其權。這一任命却使審食其得以繼續留在宮中，隨侍少帝左右，進一步強化了他對後宮秘事的發言權。當大臣們誅滅呂氏，轉過頭來準備收拾少帝時，審食其的價值就突顯出來。他以揭露呂后秘辛、舉報少帝僞冒作交換，於次日即復職左丞相。當然，這樣得來的地位不可能長保。不到兩個月後，少帝被廢，文帝抵京，局勢趨於穩定，審食其便失去價值，免相居家，至死不再起用。

同樣被免官居家，曹窋的情況與審食其很不相同。如《史記》所言，在群臣決議族滅呂氏時，曹窋站在了反對的立場。我推測，這樣做至少有四個方面的理由。第一，此時劉氏政權的威脅已經解除，族滅呂氏於公無益。第二，呂氏輔佐劉邦建立帝業，功勳卓著，不僅是外戚，也是豐沛功臣集團的代表。第三，曹窋之父曹參是豐沛集團的核心人物，曹氏家族與劉氏、呂氏均關係密切。惠帝時，曹參爲相，曹窋爲中大夫，是隨侍惠帝的親近之臣。呂后四年，又以窋爲御史大夫。以功臣之子而爲公卿，在當時可謂榮寵無二。這說明，曹窋同樣深受呂氏的信任。由於這種信任，呂產與賈壽密謀起事時沒有刻意回避曹窋，曹窋才得以“頗聞其語”。第四，就個人性格而言，曹窋應該是忠直耿介之臣。惠帝命其質問乃父，曹窋謹遵不忒，結果受笞二百。可見他忠於職守，不事應變取巧。在呂氏面臨族滅時，堅持原則，力阻事件走向極端，符合曹窋一貫的立場和個性。

度之情理，以曹窋的地位和出身，僅因反對族滅呂氏，似還不足以免官。他很可能還試圖阻止大臣誣稱少帝、諸王非惠帝子，進而反對廢立，因此才終身不得起復。曹窋死於文帝後元三年，子奇嗣侯，死於景帝三年。終文帝之世，曹氏不顯。至景帝時，曹窋之孫曹時才得以尚平陽公主，其子襄於武帝時又尚衛長公主，回到了與曹氏貴族身份相稱的地位。文帝如此薄待曹氏，直接原因恐怕就是曹窋在廢立之際的態度。

^① 《史記·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》中的相關資料，蒙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周波先生提示，謹此致謝。

三

漢初政治處在不穩定的時期，權力的平衡一再打破，又一再重建。呂后、文帝之際，大臣周勃等族滅諸呂、廢除少帝方案，與曹窋盡量維持現狀的方案，最終導向不同的權力平衡。兩者之爭，既反映了漢初政治的特殊結構，也深刻影響了此後的政治走向。

劉邦生前建立的政治體制，是劉氏皇族與從龍功臣構成兩大最高統治集團分享權力，共治天下。高祖十二年，與群臣刑白馬而盟，約定“非劉氏不得王，非有功不得侯”^①，再加上非列侯不得拜相的慣例，分別保證了劉氏皇族和功臣集團的政治特權^②。在此之外，呂氏集團於惠帝以後逐漸壯大為第三股勢力。呂氏一方面是劉氏姻戚，與皇族緊密相連，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功臣集團的利益。史稱：“呂后為人剛毅，佐高祖定天下，所誅大臣多呂后力。呂后兄二人，皆為將。長兄周呂侯死事。”^③顯然，呂氏的權威不僅來自外戚身份，他們的功勳和死難，都是其政治合法性的來源。就呂后而言，她與蕭何、曹參等豐沛元從功臣還有布衣之交。高祖身後，呂后讓蕭何、曹參、王陵相繼為相，大體遵照了功臣集團的位次。惠帝時期，實際控制漢廷的基本上都是功臣集團，呂后則居於功臣和劉氏之間，維繫着雙方的均勢。

惠帝是劉邦嫡子，長於戰亂，雖然後期病不聽政，在功臣中尚有威信。一旦惠帝駕崩，少帝即位時年方沖幼，功臣集團對劉氏的壓力立即突顯出來。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載：

孝惠帝崩，發喪，太后哭，泣不下。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，年十五，謂丞相曰：“太后獨有孝惠，今崩，哭不悲，君知其解乎？”丞相曰：“何解？”辟彊曰：“帝毋壯子，太后畏君等。君今請拜呂台、呂產、呂祿為將，將兵居南北軍，及諸呂皆入宮，居中用事，如此則太后心安，君等幸得脫禍矣。”丞相迺如辟彊計。太后說，其哭迺哀。呂氏權由此起。^④

《史記》所載容或有誇飾的成分，但此事仍可說明當時的形勢。惠帝死時，劉氏之力突然削弱，而功臣集團王陵、周勃、陳平等把持朝政和兵權，才幹、資望和實力均在漢廷劉氏皇族和諸呂之上，權力的天平發生傾斜。呂后攜幼孫登位，面對座下一眾難以控制的虎狼之臣，心中的憂懼恐怕正如張辟彊所言。因此而無暇悲痛，哭不下泣，不難理解。反過來，對於功臣集團而言，呂后也足以令人敬畏。她的不安可能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，這是王陵等人絕不願意看到的。因此，雙方都意識到需要作出某種調整，以達到新的平衡。早慧的張辟彊洞悉了其中的機妙。他建議

① 《史記》卷五七《周勃世家》載周亞夫引述“高皇帝約”，第2077頁。

② 關於“白馬之盟”的背景、內容和意義，參李開元《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：軍功受益階層研究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0年，第190—195頁。關於漢初的丞相選任慣例，參同書，第203—209頁。

③ 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，第396頁。

④ 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，第399頁。

以丞相王陵為代表的大臣將宮衛兵權讓渡給呂后的三位侄子，表明無意威脅皇權。這個新的權力分配方案一實施，以呂后為軸心結合劉、呂二氏為一方，功臣集團為一方，便達成了新的政治平衡。然後，呂后終於可以恢復常態，哭泣盡哀。

然而，這個平衡仍然很不穩定。大臣們沒有想到，呂氏掌握兵權後沒有立即收手，反而進一步準備立諸呂為王。這一企圖違背白馬之盟，立遭右丞相王陵反對。但此時呂后臨朝稱制，諸呂兵權在握，天平已經倒向呂氏一邊。王陵直諫後隨即免相，陳平、周勃等只能隱忍不發。

呂后稱制期間，呂氏權力走向鼎盛，其中也潛藏着危機。當時，呂后兩位兄長都已謝世，同胞只剩其妹呂嬃，而妹夫樊噲也在惠帝七年故去。掌握兵權的呂產、呂祿都是子侄輩，才能、資望遠遠不如周勃、陳平等從龍元功。也許呂后預見到自己死後，諸呂親族中缺少能與大臣抗衡的人物，在去世前的一年中，先後封呂祿、呂通二人為王，欲求強化呂氏的力量。然而適得其反，這種名實的扭曲，對諸呂和功臣兩方面來說，都只是加劇了不穩定因素。呂后在世時，由於她的特殊身份和威望，對諸呂和功臣均有所牽制，勉強維持了表面的平衡。等她一死，長期積累的矛盾便迅速爆發出來。

諸呂失去支柱，居高位、握重兵，而有累卵之危。大臣既不服呂氏封王，又擔心諸呂擁兵，於己不利。雙方均蓄勢待發。曹窋通報呂產與賈壽的密謀，點燃了政變的導火索。他的本意，是通過功臣集團先發制人，在變亂萌芽之初化解漢家統治的危機，將政局動盪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。而誅殺呂產後，劉家天下和高祖盟約的威脅已經解除，功臣集團面臨兩個選擇：一是迅速收縮戰綫，依託現有基礎，恢復高帝時期劉氏與功臣共享權力的政治平衡；一是擴大戰果，徹底重構皇權，建立功臣集團占據壓倒性優勢的新體制。是否族滅呂氏，恰好處在選擇的分岔路口。最終，以周勃、陳平為代表的大臣選擇了後一條道路。

歷史的記載總是偏重於勝利的一方，而遺落下未被挑中的選項。《史記》記載曹窋“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”，透露出當時仍有重臣主張前一個選項。除了這條偶然的記錄外，當時還有誰反對滅呂氏、廢少帝，現在已經無法考證。不過，可以肯定，曹窋不會是功臣集團中唯一的特例。

夷滅諸呂之後，在廢立的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意見，即便贊同廢除少帝，更立哪一位劉姓諸侯也存在多種選擇。齊王劉襄、淮南王劉長都曾被納入討論，大臣最終選擇的則是代王劉恒，即後來的漢文帝。表面上的理由是劉恒年長仁孝，母家謹良，實際則是貪圖其實力最弱，便於控制。由此，滅諸呂、行廢立的功臣取得了相當的優勢。史載文帝即位之初，周勃為丞相，“朝罷趨出，意得甚，上禮之恭，常自送之”^①。

這種優勢維持的時間很短。文帝二年十月，陳平死，功臣集團失去了智囊。三年十月，文帝強令周勃免相就國，通過列侯之國和將侯國遷移至漢郡轄下，完全控制了功臣集團。功臣集團選擇了一個看似最弱的皇帝，却以意想不到地迅速失勢。這當然與低估了漢文帝的才略有關係，

^① 《史記》卷一〇—《袁盎傳》，第2737頁。

若從內部尋找原因，則是功臣集團在“是否族滅呂氏”、“是否施行廢立”、“立誰為新君”這一連串的選擇中分裂了。能夠選對所有答案的大臣，終究不會是絕大多數。未能走對路線，特別是沒有支持代王入繼的功臣及其家族，在文帝即位前後紛紛失勢，曹窋只是其中之一。功臣集團的整體力量，因此大為削弱。

與之相對的是劉氏皇族力量的迅速擴張。這一方面表現在皇權日益擺脫高祖功臣集團的控制，得到伸張，另一方面則是同姓諸侯的崛起。劉氏宗親充分參與和影響了滅諸呂的過程，在外有齊、楚，在內則有朱虛侯章、東牟侯興居。特別是劉章，奉命領兵擊殺呂產後，又自作主張斬殺長樂衛尉呂更始，故意擴大事態，裹挾着大臣們一步步走向極端。劉興居則在文帝抵達前主動請纓“除宮”，翦除少帝。他們這樣做並不出人意料，因為滅呂氏而行廢立，最大、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劉氏宗親。

惠帝、高后時，高祖諸子趙隱王如意、趙幽王友先後為呂后所殺；趙共王恢不堪王后呂產女凌虐，自殺；燕靈王死，呂后殺其美人子，無後國除。而在誅呂產後不到十天，劉恢子遂即復王趙國，封地為呂產所侵的濟川王也徙回梁地。文帝即位後，琅琊王澤徙封大國燕，王子侯劉章、劉興居本也可受封大國趙、梁，僅因文帝知其初欲立齊王，黜其功，乃割齊二郡王之。除了上述取得實地的皇族外，由於文帝以小宗入繼大統，削弱了漢廷對諸侯的正統地位，其餘諸侯王的地位也在無形中上升了。隨着功臣集團和劉姓諸侯勢力的消長，文帝以後，政治史的主題很快由劉氏與功臣集團的角力，轉變為劉氏內部漢廷天子與同姓諸侯之爭。

王朝建立以後，功臣集團隨時推移而逐漸衰敗，本是常情。但建漢元勛族滅呂氏、強行廢立的極端舉措，徹底毀滅了恢復漢初體制的可能，最終加速了他們自身的隕落。這是解讀曹窋在高后、文帝之際的政治表現，給予我們的啓示。

（作者單位：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）